



营 养

魏振强

本期周刊的作者，有人已近古稀之年，有人正值壮年，还有的正逢青春年华，他们从不同的年代走来，受教育的程度以及成长的背景各不相同，人生经历也不大一样，但他们的书写都指向

同一个核心：成长。有人从同窗情谊中获得温暖和慰藉，有人从挫败中重新站立，有人倏然发现，时光流逝，友情不复存在，人心开始疏远。文字中有欣喜、昂扬，也有失落、迷茫和感喟。但转过身来，他们都有共同的收获——在生活的浪潮中，学会感恩，自我调整，接受现实，然后继续向前。

生活本就是大课堂，除了接受家庭和学校的熏陶、启迪之外，所有人都在不停地被他人，被世界所改变。这些外来的事、物、人，无论是好是坏，无论美丽或丑陋，于生命而言，皆是营养——如果一个人从已发生的一切中获得感悟，获得力量，乃至获得新生的话。

版式：伟东

河同水密

解良

流过家乡小城的河叫苏子河，河南岸有四所小学。小升初，三所小学的毕业生入河南中学，另一所小学对口河北中学。我与田野同住河南岸，成为初中同班同学。转眼，几十年过去，彼此的记忆里还珍藏着同窗期间的两件经典趣事。

班级搞文艺晚会，我将课文《归队》改编成相声，演技不行，就想在服装上给大家一个惊喜，让我感到为难的是没有选择余地，男同学服装同款，皆蓝色学生服，社会上的男人也是清一色的人民服和中山装，搞不到奇装异服，不过演出那天效果却很显眼，由田野借来的他姥姥压箱底的棉大褂让一段不太好笑的相声有了笑点。

另一件趣事他记忆犹新。我家盖了新房，我拥有一间屋，约要好的同学来家里住，他是其中之一，睡到半夜却被父亲揪回了家。他说，他父亲进屋先将我揪起来，一看不是才去揪他。我睡得踏实，醒来竟不记得这些细节。

中学毕业我们分开，下乡去不同的林场，他当兵去丹东，我去呼伦贝尔，退役后回县城工作没几年他又调到本溪市工作，我则留在老家的县城。他时常回老家看望父母，与我们小聚，我也去本溪看过他，可以说几十年来我们的关系一直在线，没想到退休后我们又投奔

女儿来到北京，他住朝阳，我住海淀，转眼又是十年，每次小聚同窗又同桌。

田野家哥四个，都是孝子，尽管有两个弟弟在老家照顾母亲，他每年都要回去一两个月陪老妈，给老妈做饭，陪老妈散步，陪老妈过年，让我领悟了“孝子爱日”一词的深意。十年间，我们还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为家乡的一位抗日女烈士的故事续写了新篇章。

几年前，田野送我一本他三姨刘淑云创作的散文随笔集，书名《生命赞歌》。与田野同窗时，几个要好的同学时常到住在街边他外祖父家打站脚。三姨是一位年轻的女教师，后来嫁到本溪。田野的外祖父，外祖母慈眉善目，喜欢孩子，尤其外祖父刘善亭，读过私塾，是画匠，民间雕梁画栋的手艺人，积极投入新中国建设，让自家的画铺参与公私合营，成为县百货公司的股东。我读《生命赞歌》，从一篇散文《映山红开了的时候》里读到一个名字：刘桂贞。我曾做过一段地方党史搜集、编纂工作，从家乡旷日持久的抗战史中了解到抗日刘桂贞烈士的故事，再住下读，三姨称女烈士姑姑。原来她们是亲属！

刘桂贞生于1914年，是县街里第一批人“劝学所”读书的女童，因唱歌好听人称“铜嗓子”。她剪短

发，放足，学会手工刺绣即绣出一幅孙中山像，被老师悬挂在教室墙上。她读县街兴京女子中学，与同学们一起上街游行示威，抗议日本帝国主义在长春制造“万宝山事件”。1932年4月，十九岁的她唱着《铁血歌》投笔从戎，加入辽宁民众抗日自卫军第六路军，任宣传队长。深秋，在苏子河下游一个叫南加禾的村庄，为引开包抄围剿的日伪军，她调转马头，向着部队撤退的反方向奔驰而去，被敌人穷凶极恶的子弹射中腹部，忍着剧痛将肠子压回体内，用手帕堵住伤口，艰难地向前爬行……

三姨在《映山红开了的时候》一文中写道：“当父亲赶到的时候，姑姑刘桂贞已经牺牲了。我的父母曾多次冒着生命危险营救他们，但这一次他们救回的是刘桂贞的遗体。”

看到这里，我立即发微信给田野，询问他外祖父运回刘桂贞烈士遗体情况。他马上打电话与母亲与三姨核实，外祖父刘善亭与刘桂贞为姑表亲，表妹殉难的消息传到县街，外祖父冒着生命危险，赶着一辆大车辗转百余里，将陨落苏子河下游的刘桂贞烈士的遗体拉回县街，安葬了。苏子河从县街流过，向下游流延百余里，由烈士牺牲地向南伸展，入浑河。我当年搜集、

编纂地方党史时并不知道刘善亭临危不惧赶着马车拉回烈士遗体这段情节，若非三姨写文章缅怀英烈，这段史实还埋藏在我们身边，鲜为人知。这件事给我一种特别的亲近感，刘桂贞的父亲当时在县街开肉铺，年迈，无力料理为国捐躯的女儿的后事，年轻的画匠刘善亭不忍烈士曝尸荒野，挺身而出，迎着腥风血雨，赴汤蹈火，让烈士的英灵回归故里。九十多年过去，我仍然能感觉到英烈的血缘、亲缘就像这片土地与母亲河，息息相关，絮絮不止。我写下《山顶有颗红五星》一文，发表在《安庆晚报》上。



解良，辽宁人，中国作协会员。有小说集、散文集出版。现居北京。